

⇒ MBA & MPA 丛书

N 科学、技术、社会 (STS)

赵国杰 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MBA & MPA 丛书

科学、技术、社会 (STS)

赵国杰 著

天 津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科学·技术·社会/赵国杰著.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3.4
(MBA _ MPA 丛书)

ISBN 7-5618-1755-X

I. 科... II. 赵... III. 科学技术-影响-社会发展 IV. G3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1965 号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杨风和

地 址 天津市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内 (邮编: 300072)

电 话 发行部: 022-27403647 邮购部: 022-27402742

印 刷 天津市宝坻区第二印刷厂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40mm

印 张 12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次

印 数 1—4 000

定 价 60.00 元 (共三册)



赵国杰（1950～）现任天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技术经济及管理专家。保定市人；曾务农做工，读清华大学本科，获天津大学硕士学位，曾任天津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

喜爱文学、哲学、心理学和历史，有诗词发表。目前的研究方向：技术经济原理与方法，STS（科学、技术、社会），技术进步对企业战略和组织结构的冲击及其回应。

迄今4次获省部级奖：2002年获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第八届）；1999年获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第七届）；1999年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999年获天津市软科学三等奖。但自认最重要的、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1957年在保定市上小学2年级时获得的保定市少年儿童优秀作文奖，它激起我迄今未止的写作欲望。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妻子——王淑兰：

感谢她的爱和支持！

我的爱子——赵墨非：

感谢他的博览、妙语和灵感！

中国的 MBA 和 MPA：

感谢你们翻阅此书，祝你们成功！

读什么？怎样读？

——写给 MBA&MPA 学子权当序

现在的书真多，出得也真快。面对这么多的书，读什么？

鲁迅先生说，“随便翻翻”⁽¹⁾；林语堂先生力主“真正的读书”。什么是真正的读书呢？林先生拈来一例，譬如“风雪之夜，靠炉围坐，佳茗一壶，淡巴菰一盒，哲学经济诗文，史籍十数本狼藉横陈于沙法之上，然后随意所之，取而读之……”⁽²⁾由此观之，林先生的“真正的读书”与周先生的“随便翻翻”形似神同。

然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似不大赞同林先生的兴趣谈书法。他认为“凡欲成就一种学问者”，“读书尤其是一种训练，一种准备”。“有些有兴趣的书他须得牺牲，也有些初看很干燥的书他必须咬定牙关去硬啃……啃出滋味来”。⁽³⁾

MBA&MPA 是要“入市”的，恐难像林先生那样真正地潇洒。何况“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所以你须慎加选择”。⁽⁴⁾

怎么选择呢？池田大作劝人“精读一本书”⁽⁵⁾，曹聚仁先生集 30 年读书之经验，当他只能劝一句时，他劝青年“莫读古书”。⁽⁶⁾

从四五岁开始“随便翻翻”至今，我已翻过 48 年了，深深服膺鲁迅先生的治学要先治史——“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单明白而可靠的书”⁽⁷⁾。因此，我常向我的博士生、硕士生们推荐丹尼尔·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我相信，精读此书，MBA&MPA 至少可以不为数以百计的管理学书籍去劳神。此外，无妨“随便翻翻”我写的这几本小书，你们会发现，很有新意；你们会感到，颇受启发。

把精读和随便翻翻结合起来，恐怕还不行。那怎么“读”呢？赵墨非 11 岁时写过如下一段话：

“我曾深信，读书一定要下苦功夫。李白不就是看到老婆婆用铁杵磨绣花针，才幡然醒悟，发愤读书，终成诗仙的吗？

我也曾深信，读书一定要广博。‘读书破万卷，下笔才有神’嘛！然而，近日拜读胡适先生的大作《读书与治学》，终使我明白：那些说法确为名言，但绝非至理。其实，读书更重要的是选择、质疑、实践和创新。

诚如先生所言，读书有三要：一是读何书（即选择）；二是读书的功用；三是怎样读书。在先生看来，读书一要精；二要博。所谓精是指‘眼到、口到、心到、手到，’其关键是心到、手到。因为‘学源于思’（宋·程颐），且‘学则须疑’，‘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有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宋·张载）。故读书必须质疑。而‘手到是心到的法门’（胡适），手到就是‘去取、记述、整理和发表。’故读书一定要实践。

读书不能只是继承，而要创新，即：要有自己的新的思考，要有自己的新的见解，才是真正挖掘透了一本书。诚所谓‘学贵心悟，守旧无功’（宋·张载）。

其实，古今中外因读书方法的差异使结果差之千里的事层出不穷，兹信拈两例：

欧几里得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几何学的第五公设：‘过直线外一点，只能作一条直线与第一条直线平行。’对此，大家都确认无疑，视为真理。可高斯、鲍耶、罗巴切夫斯基等大科学家却心生怀疑，勇于探索，终于提出作出两条平行线的新公设，创立了全新的非欧几何学……

相反，战国时期的赵国将军赵括自幼熟读兵书，倒背如流，与其父赵奢论及兵法，巧舌如簧，口若悬河，俨然将军气概。可一旦亲临沙场，与秦将白起对阵，却死搬兵书，致使40万赵军死于非命。呜呼，博读强记死读不亦悲乎！

血的教训，不是应该使我们猛醒吗？读书，一定要选择、质疑、实践和创新。”⁽⁸⁾

读书，一定要选择、质疑、实践和创新。这很重要，MBA&MPA们不妨试试。

赵国杰

2002.6.15

注：

- 1 鲁迅．随便翻翻．鲁迅全集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2 林语堂．读书的艺术．大荒集，不详：生活书店，1934
- 3 朱光潜．谈读书．朱光潜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
- 4 朱光潜．谈读书．朱光潜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
- 5 池田大作．精读一本书．引自：刘克敌编．读书苦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 6 曹聚仁．我的读书经验．芒种，1935，1（3）
- 7 王梓坤．科学发现纵横谈．北京：中华书局，1998
- 8 赵墨非．读胡适的《谈书与治学》有感（J）．科技先导，2000（11）

目 录

从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决策模式的伟大创新中你能悟出什么·····	1
世界的多线发展与中国的发展路径创新·····	6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走向繁荣的路径创新·····	10
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	16
怎样改革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24
货币金融调控目标——手段体系的选择与完善·····	32
地区产业结构研究模式的问题及新研究途径的探索·····	37
中国区域投资有效性评价·····	41
投资效应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影响分析·····	50
我国区域投资中的问题及其对策·····	54
日本的技术密集城市与我国星火技术密集区·····	60
对星火计划管理模式的评价·····	65
星火技术密集区示范效应测评·····	68
农业集约化与扩大再生产理论探微·····	75
对林毅夫关于中国 1959~1961 年农业危机主因假说的定量检验·····	86
经济理论发展模式初探——“科学革命”还是“研究纲领”？·····	93
建构新的系统科学观的尝试·····	97
发展技术经济的构想·····	108
技术的维-色-相结构研究·····	113
技术进步机制的三阶段分析与整体研究·····	118
绿色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稳定机制与动力系统——ECIS 分析·····	125
以人的创新为核心的螺旋形国家创新体系演化机制分析·····	132
美国钢铁业技术落后及沉没成本效应化解的经济分析·····	140
技术引进项目后评价方法初探·····	146
对大学生高校教育感知质量测度的初步研究·····	150
基于 ACSI 模型的中国银行业顾客满意度测评·····	156
CIMS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研究·····	161
“李约瑟难题”求解述评·····	168
对中国企业文化热的冷思考·····	175
塑造成功的企业文化是创新的根本保证·····	180
后记·····	183

从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决策模式的 伟大创新中你能悟出些什么^{*}

从邓小平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蓝图构想的整个历程可以看出邓小平战略决策的两大特点：一是传统理性决策与有限理性决策相统一；二是渐进决策与激进决策相统一，从而构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创新的系统战略决策模式。邓小平的这种新系统战略决策模式既是科学的，又是科学决策模式的伟大创新。

以往的邓小平思想的研究者几乎未进行这方面的探索，本文的研究旨在填补邓小平思想研究的这一空白，并从理论上概括邓小平战略决策的新模式——“有限理性—系统方法—渐进·激进方式整合的决策模式”。

一、发展战略研究的模式与程序

研究和制定发展战略，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回答如下三个基本问题：

- (1) 我们目前所处的态势如何？
- (2) 我们期望未来出现什么样的态势？
- (3) 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来实现预期的态势？

这实际上是解决任何问题所采用的一个通用决策模式。发展战略研究的程序就是建立在科学的决策模式的基础之上的，迄今为止形成了三种主要的决策模式：

- (1) 传统的战略模式，即系统分析的方法，又称“理性决策”模式；
- (2)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教授的“有限理性”模式；
- (3) 美国威尔逊政治学术奖获得者“政策分析”创造人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教授的“渐进决策”模式。

1. “理性决策”模式

在“有限理性”模式和“渐进决策”模式尚未出现之前，最有影响的战略决策模式是理性决策模式。该模式的主要观点是：

- (1) 决策者知道所有同问题有关的目标；
- (2) 所有有关问题的信息都是可得；
- (3) 决策者能辨别所有的选择；
- (4) 决策者能有意义地评估这些选择，即研究选择的结果并加以衡量和比较；
- (5) 所做的选择能最大限度地扩大决策者预期的价值。

显而易见，理性决策模式是从规范的角度去考察问题并进行决策的，它深受早期

^{*} 以“试论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决策模式的伟大创新——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思考”为题，发表于《广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35～38页。

经济理论的影响。传统的经济理论假设“经济人”知道全部可能的行动及其产生的效果并选择效果最优的行动方案。受这种理论的影响，理性决策模式认为人在战略决策活动中也是完全理性的。

这一决策模式的研究方法虽带有明显的传统特征和不尽合理之处，但其形成的系统分析框架却是科学有效的。它把发展战略全过程用图 1 予以表示，而将发展战略研究的一般程序划分为图 2 所示的三个基本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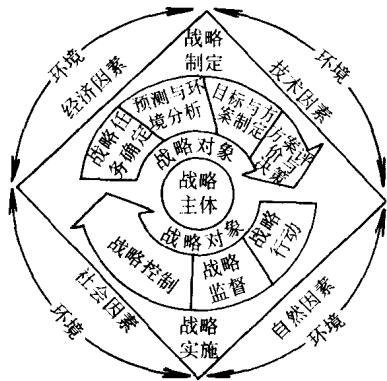


图 1 发展战略全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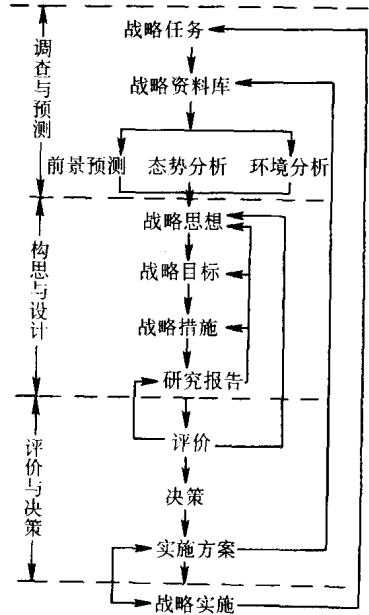


图 2 发展战略研究的一般程序

在传统的理性模式中，决策者把某些东西提到极限，如毛泽乐的“要在 10 年甚至更短时间内超过英国的战略目标”；又如 1964 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在 20 世纪内全面实现四化，使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战略目标”；再如 1978 年 2 月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 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些显然都是极其宏伟的，然而又是不能如期实现的战略设想，甚至战略幻想。

2. “有限理性”模式

“有限理性”模式从实证角度对决策系统追求最优的理性模式进行分析和批判。认为：

- ①决策者事实上并不具有有关决策状况的所有信息；
- ②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
- ③决策者在有了有关决策状况的简单情况后就行动；
- ④决策者的选择行为受所得信息的实质和先后次序的影响；

⑤决策者的能力在复杂的决策状况中受到限制；

⑥决策行动受到决策者过去经历的影响；

⑦决策行动受决策者个性的影响。

总而言之，就是决策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在决策中应以“满意”来代替“最佳”。

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提出显然是以“满意”来代替“最佳”，充分考虑到中国现代化的困难性和艰巨性，决不盲目乐观，急于求成。与三届人大和五届人大提出的现代化目标相比，邓小平不仅把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往后推了 50 年，而且把“走在世界的前列”降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1]。与前者的高调目标相比，邓小平定的目标无疑是低调的。而这个低调目标恰恰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建国以来我们犯的几次错误，都是由于要求过急，目标过高，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结果发展反倒慢了”^[1]。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很多，因为“中国科学技术落后，困难比较多，特别是人口太多，现在就有十亿五千万，增加人民的收入很不容易，短期内要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很不容易。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把目标定得不切实际，也不能把时间定得太短”^[1]。因此，我们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是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1]，“……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1]。而且即使这个低调目标，对我国来说，也是“我们的雄心壮志。目标不高，但做起来可不容易”^[1]。由此可见，邓小平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并不是凭空设想的，其低调战略构想建立在中国人民经过 70 年艰苦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的基础上。邓小平的战略目标的构想以“满意”替代了“最佳”。

3. “渐进决策”模式

“渐进决策”模式，从另一个角度对传统理性决策模式提出了挑战。它认为，决策过程只是决策者基于过去的经验对现行政策稍加修改而已。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看上去似乎行动缓慢，但积小变为大变，其实际速度要大于一次大的变革。政策上的大起大落的变化是不可取的，往往“欲速则不达”，它会危及社会的稳定。因为从技术上讲，决策者无足够的时间和智慧或其他资源去调查所有的政策方案，调查每一次政策的后果。此外，现行计划可能已投下了巨大的资本和精力，这就部分排斥了巨变，否则会带来一系列组织结构、心理倾向、行为习惯的振荡和财政困难。直接决策者是权力运用的主要角色，他们处于决策阶梯的顶端，决定由他们做出，但他们受制于其他力量。在相互影响和作用的过程中，直接决策者既要对社会公众和各种团体的选择和要求做出反应，更要积极地以各种方式去影响下层。这样，决策过程就是一个循环的。

渐进决策作为一种决策思想和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当的价值。从认识论上说，渐进决策的特点在于以历史和现实的态度将事物运动看成是一个前后衔接的不断断的过程，即无论哪种新的决策，只能在直接碰到的、现实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进行，这些条件包括历史和现实的特点，包括决策者本身条件以及整个社会、组织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心理结构。在方法上，渐进决策注重事物变化的量的积累，以量变导致质变。它强调在进行改变时维持社会和组织的稳定，因而主张不间断地修正，

而不是引起动荡的变革，逐步地对政策加以修改并最终改变政策。从决策角度看，渐进决策在某种条件下的确定是一种有用的科学思想和方式。

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蓝图的构思历程充分体现了其决策过程的渐进性。这首先体现在，在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特定条件下，邓小平开始提出其 20 年走向小康的战略。这一战略决策把原来我党提出的要在 20 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降低了，但这种小康目标和现代化目标的差异在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中并不去强调和突出，以便使党和国家能顺利地接受。当全国确认这一战略后，邓小平又先提出 70 年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随后又进一步将其降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正是这种连续渐进地修改发展战略目标的决策过程才能为全党全国人民顺利地接受。

其次体现在邓小平为中国实现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选择的战略途径是改革体制，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 年 11 月 26 日他就认为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但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对邓小平的这一战略途径迟至 1991 年还有人反对；全党也是几经反复，先接受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再退回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又前进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又重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甚至直接把邓小平 1989 年 6 月 9 日讲话中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表述改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给人以邓小平观点发生变化的假象。在这十几年中，邓小平要以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发展中国经济的战略设想虽然一直未有改变过，但其提法也是逐步深化的，从 1979 年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一步一步不间断地渐进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的基本科学论断，从而完成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质的飞跃。

二、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决策模式的创新

如上所述，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的决策具有渐进和有限理性的特色，但其战略决策模式并不就是“有限理性”模式和“渐进决策”模式，也不是二者的简单整合。因为渐进决策模式仅仅是在某种条件下适用的模式，即它一般适宜于比较安稳和变动不大的环境，以及从总体上说是比较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一旦社会条件和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一旦表明对以往的战略需加以彻底的改变时，渐进决策所主张的修正和缓行就起不到它的作用，有时甚至会对大变革起阻碍作用。历史表明，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性时刻，需要在政策上做大幅度的调整，有时甚至是抛弃以前的政策而重新确立新的政策。如果我们把这种方式称做激进决策的话，那么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决策的渐进性恰恰是建构于邓小平对思想意识领域中的两个“凡是”的激进变革基础之上的。邓小平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激进决策正是充分注重历史的当时现实条件而做出的。从战略决策角度讲，引起震荡的意识变革正是促进社会经济渐变但发展迅速的一个必要条件。总而言之，在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过程中，有时需要采用渐变的决策方式，有

时则需要剧变的决策方式，一切应以时机、地点、历史和客观条件而定，当然能够灵活而有效地选择战略决策模式甚至在同一时期内在不同领域中把不同的战略决策模式有机地融合成一体，这的确需要战略决策家本人富有想像的创见和运用娴熟的艺术。邓小平正是这样一位战略决策的艺术大师。

在一切似都已陷入山穷水尽之中的 1978 年，正是邓小平在深深的焦虑和思考之后，毅然立起一面大旗——改革。正如邓小平 1987 年 6 月 12 日会见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所指出的：“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的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 1957 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 1957 年到 1978 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所以，从 1978 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1]

1992 年改革进入第 14 个年头，也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和微妙的时期。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变，我国的改革渐进地但已深入地发展到了要触及产权、市场经济等一系列制度改革问题时，有人抛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的理论，企图以危言耸听的奇谈怪论阻挡改革的进程。鉴于此，邓小平在南巡重要谈话中针锋相对、字斟句酌地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1]在这两个不同的历史关头，邓小平毅然选择激进方式做出改革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制的战略决策。

因此，我们认为，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决策形成了他特有的模式：针对不同时机、历史和客观条件有机地整合运用激进方式和（或）渐进方式，运用系统方法确立现实可行的满意目标。可简称之为“有限理性—系统方法—激进·渐进方式整合的决策模式”。

参 考 文 献

- 1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世界的多线发展与中国的 发展路径创新^{*}

怎样才能既加速深化改革，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怎样才能既加快发展的速度，又避免金融震荡和经济波动？这一切都离不开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科学认识，离不开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和客观要求的正确把握。

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探索

人类历史自 19 世纪中叶至今的发展既证明了马克思预见的科学性，也发生了马克思未曾预料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更高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现代市场经济，创造了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和基本上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目前还看不到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全面爆发的迹象。

第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不是后资本主义的演化体，而是脱胎于前资本主义，其社会经济是有商品货币关系但无发育成熟的市场的一般商品经济转变而成为行政性计划经济。这种社会主义事实上不是标准的社会主义，它还不是马克思定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尚未摆脱贫困的并不具有全面优越性的社会主义。

1. 前苏联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及其教益

鉴于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偏差，列宁率先对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阶段进行了探索，对社会主义形成了创新的认识^[1]。其次是布哈林，他也对社会主义在前苏联的发展阶段进行了现实的研究。戈尔巴乔夫则在苏联改革的前期（1985~1988）进行了独到的探索和研究。

列宁在实践中首先认识到，像俄国那样的由于历史进程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愈落后就愈要经历许多过渡阶段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此外，他还对社会主义一般的自然发展趋势进行了描述。布哈林同列宁一样，认为苏联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可惜这种正确的认识很快就被斯大林所摒弃，于 1936 年正式宣布“苏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此后，赫鲁晓夫于 1961 年 10 月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 20 年“共产主义建成论”；安德罗波夫执政后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估价降低，从“建成论”降到“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2]。

1985 年上台的戈尔巴乔夫则提出了“发展中社会主义”和“改革阶段”的基本估

^{*} 原载于《河南社会科学》2001 年第 5 期，18~20 页。

价，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进行了一些探索。

2. 中国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及教益

在摈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之后，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从而为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石。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讲过：“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3]十多年来，理论界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从未停止过，甚至在中共中央文件中，也存在反复。中共十二大时，讲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概念；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反而使用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提法。在经过改革所要建立的新经济体制的问题上，我们始终不敢提“市场经济”四个字，咬文嚼字的结果是导致多次改革的停顿、经济的滑坡，为此，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实际上，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改革目标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模式仅有一纸之隔，但历史又无情地拉大了它们之间的距离。

二、重新探索：世界各国的多线发展与中国发展的路径创新

1. 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有可能走上独特发展道路的探索

把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即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归结为“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种五阶段演化模式，无疑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种过于简单的极易导致误解的抽象。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从来不是机械的、命定的，而是辩证的、可选择的。

马克思始终坚持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至少存在两种主要模式：自原始社会开始解体，直至前资本主义时期，这种演进既可以是西欧式的，表现为在前资本主义的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在整个社会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和支配地位；也可以是亚洲（主要是印度）式的，表现为在前资本主义的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在整个社会经济关系中不占主导和支配地位，而只是历史发展的一种主要趋势、倾向和标志。不同的历史环境决定了或者准确地说选择出上述两种社会经济形态演进模式。

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演化至少是双线并存的，其中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并不能完全用生产水平的差异予以科学的解释，而是由具体原因决定的一种社会主体选择的结果。归根结底，一切都取决于社会所处的历史环境。

笔者认为，考察中国的发展和今后的改革，更应该按照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多角度地进行系统分析。

2. 历史的实证考察和发展模式的多角度综合

人类社会的历史究竟是如何发展的，这不是一个可以先验构造的模式，而是历史地呈现出来的实际过程。鉴于此，首先从生产方式和所有制的角度来简述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历史发展道路，然后从中抽象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模式。

(1) 西欧。一般地说，这个地区是沿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条道路发展的。但是，该地区的日耳曼民族则例外，居住在莱茵河、多瑙河以北的日耳曼人直接从原始公社制发展到了封建制。

(2) 东欧。这个地区的斯拉夫人和其他一些较小的民族，大多没有经过奴隶制，由原始公社制直接进入了农奴制的封建社会。只有巴尔干半岛在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下经历了奴隶制社会。西斯拉夫人从9世纪开始，建立了摩拉维亚、捷克、波兰等封建国家。东斯拉夫人和诺曼人居住在后来成为俄国土地的东欧平原上，诺曼人于9世纪后期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了最早的封建国家基辅罗斯，标志着这一地区由原始公社制进入了封建农奴制。

(3) 亚洲。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实质上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道路问题，现在历史学界还争论不休。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傅筑夫认为，中国在西周即进入封建制社会，战国和秦帝国的建立则标志着中国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变态封建社会”并延续到清朝末期。中国的近、现代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直接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大家公认的。可以说，马克思关于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高级形态的公有制社会的预言，在中国变成了现实。亚洲大陆的蒙古国、朝鲜、越南等，也都直接由封建社会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4) 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非洲，在欧洲殖民主义者到来之前，有些地区已经建立了封建关系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有些地区则刚刚完成由原始公社向私有制社会过渡的阶段。在赤道非洲和南部非洲，许多民族处于原始公社制度的不同阶段。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使这些地区形成了长达几百年的殖民制度，并且经过这种制度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5) 美洲和大洋洲。在欧洲殖民主义者入侵之前，除去中、南美洲的少数地区进入私有制社会之外，当地的土著居民还处在原始公社制度的不同阶段。随着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入侵，这两个地区由原始社会被直接拖进资本主义社会。

从中可以看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是有规律的，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但具体的发展途径却是由具体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我们还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上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都不是也不可能是马克思所设想的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人类还必须经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才有可能达到。

第二，中国是一个极特殊的国家，历史环境与众不同，搞社会主义只能走自己的路。

第三，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设想的西欧式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但很接近马克思提出的东方社会主义模式，即通过革命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新型公有制社会。

3. 关于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预测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一个子阶段即变革过渡期阶段上，由以

往的无规范市场的行政计划一体化管理的经济体制向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非行政计划指导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化的阶段过渡。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传导性巨变的阶段，大体上以引入市场机制始，以正常市场秩序形成止。正常市场秩序形成的主要标志是：①经济合同制真正有效；②经济立法完善，经济司法真正生效；③行政不再直接干预经济，企业自主权真正得到落实。第二个子阶段是平稳高速发展阶段，即中国社会经济发生渐进性变化的阶段，其特点是市场经济机制完善、计划指导科学有效，因而社会经济能够快速持续健康地发展。其标志是：①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技术为标志的生产力接近或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②农业稳步发展，能够满足国内生活和生产需要而有余，但仅占国民总产值 15% 左右；③城乡人民消费结构改善，恩格尔系数大约为 30%；④全国建成统一市场。此后，中国将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三个子阶段，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生突发性变化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计划与市场融为一体，即公有制基础上的新型市场机制能够在计划指导之下发挥整体性调节作用。一体化的市场反馈调节和计划前馈调节使整个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使我国摆脱短缺的制约，为步入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奠定生产关系和物质两方面的基础。其标志是：①形成基于全社会利益对全社会经济生活起调控作用的计划—市场一体的调节机制；②短缺消失；③经济实力、发展水平基本上与当时的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变革过渡阶段，我们必须实行四重模式转换（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经济体制模式转换、经济运行机制转换和社会环境转换），改革才算完成，过渡阶段结束后方可进入平稳高速发展阶段。

参 考 文 献

- 1 王东：改革思路的真正源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 2 高中毅：一条马鞍形的认识曲线——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 3 龚育之：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学习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J). 科学与科学管理，1992 (6)：18